

# 輿論與政府\*

飛若翰\*\*

每個政府都有獨特的組織、規模、或政治體系。如果說所有政府都有共通點，那麼，官民之間即使並不是處於敵對的關係，亦必有一條鴻溝。

由於稅制，相當一部份的收益會被佔有、買賣須遵守規定、何處道路可通行、何處可吸煙、何處可露體或應否穿著禮服、為使“存在”合法須填寫表格、甚至連日常的時間也要被規定。因此，市民都認為政府是一頭經常干預他們日常生活的“七頭怪物”。

在極權國家，市民很快便學會不向政府挑釁，因為市民反對國家的決定或懷疑政府的善意都會招惹危險。因此，市民敵視政府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在各種民主制度中，即使表達方式不同，這種對政府的敵視態度似乎並不因而減少。例如，部份市民不參與投票。然則，行政機器是由部份市民所不信任的一小撮人所操縱；同時，亦經常將所有的“不是”全往政府身上推。至於那些支持選舉活動的人並不因此感到十分滿足。或者，這是因為他們把一些在目前不能克服的弊病歸咎於舊日的制度，又可能他們逐漸醒悟到“還不是那回事”！

---

\* 華務司譯本

\*\* 葡文澳門晚報社長、諮詢會委員

例如：本人不清楚公共行政管理與被管者之間是否會有一種真誠的、融洽的及和諧的關係。一方面，市民不會視任意支配社會生活方式的政府及行政機器為他們的代表；另一方面，那些不同職階的公職人員也不會認為那些他們毫不認識的市民是他們的“老闆”。在他們眼中，市民只不過是說謊者、是沒教養的無知者、或是有偏見的人，他們需要教育……。

## 澳門的處境

以此作為出發點並從輿論的角度來看——本人的講話亦由此觸發——澳門政府正處於一個非常困擾的位置。實施民主政體並不是由於市民選擇而導致的結果。事實上，如果施行極權統治，當選與否便不是那麼重要了。然而，澳門的情況並非如此，而是缺乏鞭策的力量和合理的投票。

更壞的，這是一個非本土人的政府，所使用的語言是那一大羣被管理的市民所難以理解的。這是一個經常困擾的處境，但在殖民制度下，這是比較容易維持的，這已是很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澳門的困難很可能不是如此，澳門不是真正的殖民地。

第一批歐洲人當中的一位遇見一隻長頸鹿，於是他上書皇帝，並在信中詳細描述那頭異獸。他的恐慌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卻在信中斷言：“正如陛下的推論，這頭動物可能不存在”。

澳葡政府所構築的架構，亦令本人有差不多同樣的感覺：一個如此這樣的政府，可能並不存在……。

應研討會主辦者的要求，本人就“輿論與政府”這個論題提出一些意見。就讓我們暢所欲言吧！

輿論在澳門一向是“獨特的”。首先，讓我們回顧這個情況，雖然沒有精確的資料支持本人的論點，然而本人認為在本地居住超過十五年的居民不足五分之一，而少於十年的居民約佔百分之五十的說法並不誇張。

肯定那一大羣市民很少或根本沒有批評政府的習慣。這麼一大羣來自中國的人以及那些在葡國舊制度時代出生澳門的人，都沒有這種習慣。

更甚者，所有的人在較早前都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寄人籬下的感覺。葡人——特別是行政當局——（在此無需細說因由）及大部份在飄揚着其他旗幟並由他人制定遊戲規則及發號施令的土地上定居的華人，都有同感。

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有這個世紀了，在過去的十餘年裏，葡國政府所管理的就是那麼一丁點兒。原則上，要確定解決澳門葡人社會的今後路向、憑藉官僚機器以保證他們在工作上的專利、管理一間醫院及為兒童而設的學校、並維護他們的

宗教信仰外，便沒有更多了。其他要處理的祇是怎樣回應——幾乎都是“拖”字訣——私人倡議的各種挑戰。實際上，在私人倡議萎縮時，澳門正沉醉在一個酣暢的午睡中。這些事情並未對這段時期的歷任總督造成任何影響，而個別總督確是耗盡心力，竭盡所能地工作。請不要忘記，那時候正值六十年代末，是人力、物力極有限及海外部在很大程度上已停止對本地區的預算提供協助的時期。

在企業家進軍澳門，大興土木及興建廠房，以至建置業空前蓬勃時，政府庫房亦開始豬籠入水，頓然使行政當局從昏睡中驚醒過來並自我膨脹一番，儼然成為全體市民的衣食父母。那時，在很短的時間內——壹個現時尚在推行的政策——政府對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等均承擔一般的責任（雖然仍視條件而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如果說澳門的輿論全無偉大的傳統並不令人感到驚奇。（請注意，在葡人組織中那些“打游擊”的習慣並不包括在內）

所有發生在澳門的都是如此獨特的（在某種程度內，這情況亦將如此繼續下去）。華人社會中一些舉足輕重的人物，藉着有影響力的媒介向總督傳遞一些訊息，指出這種或那種措施會帶來不妥或令市民欣然接受。然而，這些訊息是否全部順應民意，為民請命……。

## 最後的十年

誇張地說，80年代的澳門輿論從萌芽到取得地位及力量是眾所週知的事實。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澳葡政府“失去面子”（港英政府亦然），追源溯始是文革所引起的事而觸發的。這種情況在七十年代的加速發展，是由於官民的密切對話、市民需索增加、四二五革命及歷任總督自該日起的嶄新政治目光所引起的。

在八十年代初期（特別在八二年尾），澳門出現了由葡人私營的傳媒組織。他們在社會所擁有的人力、物力都足以制衡政府的施政，甚至直接評擊政府。這種作風極少見諸中文報章。他們的“訊息”仍保持一種較為隱晦、謹慎及溫和的態度。

港澳先後面對前途談判。在磋商香港前途初期，中文傳播媒介的表達方式出現巨大的轉變。他們與葡人同業的批評風格，亦步亦趨。

同時，以另一種姿態出現的和具有份量的輿論亦傳達政府高層：逐漸壯大的階層和利益團體很快便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喉舌。

可以說，澳葡政府的權力約在十年間從家式統治的專制地位轉為處於守勢的地位，甚至有時受制於難以忍受的壓力下，就好像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一般。

## 輿論針對什麼？

其實，針對澳門政府的批評大體上與其他行政機器所面對的並無太大分別（雖然他們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十分不同）。

世界各國所聽到的指責通常是過份的官僚作風、惡劣的官民關係、不明確的資訊、緩慢的程序、膨脹的架構及涉嫌貪污等。然而，澳門還有個別的特殊問題：公務員本地化程度不足、優待從葡國來的人員、政治的不穩定以及管理澳門的官員不了解澳門等。

這些意見是否公平在此無需提及。除了較高層次的責任感外，似乎必須指出這個行政機器缺乏團隊精神。公務員——多少類似駕車人士，在步行時便是行人——在離開辦公室時便立即成爲一個普通市民，和站在極端批評政府的位置。這並不是澳門所獨有的，而是招募的特殊條件令人側目。

在此引起的漣漪所觸發有趣的討論，勝於本人在此唱那令人生厭的獨腳戲。基於新聞界的職責及本人在輿論方面的代表性，似乎要就這個論題提出一些簡單建議，以改善官民的對話：

行政當局高層負責人與社會傳媒機構維持經常的聯繫（護理總督舉行定期的記者會值得鼓掌稱讚）。

各機關繼續努力改善接待公眾的態度，並盡量簡化所需手續。

詳細列明每一櫃台所處理的事務，以免浪費時間及令人厭煩。在一櫃台前忍耐輪候，而最後卻發覺“搭錯車”，我相信沒有比這更惡劣的情況了。

尊重公眾，迅速處理問題、信件及申請書，特別對必須費時處理的事務，更應讓當事人知悉。

工作失職，懲而不貸。

舉辦座談會、會議、會晤、聚會，均應節約，邀請外賓，更應如是。

妥善安排警務人員以處理今天意想不到罪案。

本著“防微杜漸”的原則，經常主動查核各機關的辦事效率。

爲維護消費者的利益，應有效監管專營合約公司的運作。因爲這類公司的首要責任就是如此。

繼續消除官僚作風。

以上提出的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今天經常可以碰到的。很多事例對輿論是敏感的，因爲所提出的都是直接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

最後，本人想以鄭重的態度向大家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將來會是怎樣的？壹部葡萄牙的機器由一大羣中國人駕馭，並且由一個管治資本主義地區而堅信共產主義的人所領導（由北京委任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的人員管治本地區是難以置信的）。就本人而言，與其說這是一頭長頸鹿，則無寧說這是一幅異乎尋常的圖像。

有怎樣的過去就有怎樣的將來。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今天和那麼短暫的明天。油量愈充足、結構愈簡單、運作愈有效、又能因地制宜，則所組成的行政機器就更能處變不驚、並為用家了解及接受。

這是一個恰當的時刻去提出各位期待已久的說話。要說的，已說了。

